

“伊斯兰国”与中亚地区安全*

李超

【内容提要】 目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虽然在整体上可控并保持稳定，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潜在挑战仍然存在，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北高加索地区 and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活动已经给中亚带来了外部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回国“圣战分子”的潜在威胁，社会矛盾被再次激化的可能以及区域内恐怖组织向其效忠的连锁反应则是“伊斯兰国”带给中亚各国内部的安全挑战。中亚人在“伊斯兰国”外籍武装分子中占据相当比例，这与中亚地区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伊斯兰国”对极端主义者的吸引力密切相关。“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面临的制衡因素主要包括：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的牵制，中亚主流社会对“伊斯兰国”政治理念和极端路线的不认可，以及来自中亚国家和区域组织的打击。

【关键词】 中亚 “伊斯兰国” 地区安全

【作者简介】 李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正面战场遭到严重打击，但该组织的“圣战分子”和相关恐怖主义活动存在向全球扩散的可能性。2017年6月，独联体反恐中心负责人安德烈·诺维科夫公开表示，“伊斯兰国”谋求在阿富汗建立新的势力范围以及向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事实上，在“伊斯兰国”的地缘视野下，中亚地区是其渗透的主要潜在区域，而该地区也向“伊斯兰国”输出了大量“圣战分子”，因此，“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安全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应被外界忽视。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责由作者承担。

一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带来的挑战

当前，“伊斯兰国”对中亚各国尚未发动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中亚各国政府也未将“伊斯兰国”的威胁列为其政府议程的首要问题。但“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影响是存在的，一方面，“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已在中亚南部和西部构成两块不稳定地带，对中亚的安全形势产生外在压力；另一方面，从中东返回的“伊斯兰国”中亚籍武装分子给中亚内部的稳定带来了潜在的负面影响，而该地区本已存在的宗教与社会矛盾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也有可能被“伊斯兰国”的活动进一步放大或激化。

（一）中亚地区安全的外部压力

中亚地区的外部安全压力来自其南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西部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有从这两个地区向中亚“溢出”的可能。

位于中亚五国南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一直是恐怖组织活动的热点地区，“伊斯兰国”将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亚五国统称为“呼罗珊”地区，并于2015年1月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组建了其分支武装“维拉亚呼罗珊”（Wilayat Khorasan）。目前“伊斯兰国”在巴、阿两国活动日益频繁且联系紧密，在中亚地区南部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2015年初，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乔杜里首次承认“伊斯兰国”对本国的安全已经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法律部长也确认该省存在“伊斯兰国”的活动^①。2015年5月，巴基斯坦卡拉奇市郊发生枪击案，导致43名什叶派穆斯林身亡，这是近年来巴国内最为严重的教派袭击事件。据巴基斯坦信德省警察局反恐部负责人奥马尔·哈塔卜披露，该事件是与“伊斯兰国”联系紧密的武装分子策划并实施^②。目前，巴基斯坦境内奉行萨拉菲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虔诚军（LET）及其分支达瓦慈善会与“伊斯兰国”联系紧密，其成员更是负责直接指挥和联络在叙利亚参加圣战的巴籍武装分子，而反什叶派激进组织强戈维军（LEJ）的

^① Farhan Zahid, “Growing Evidence of Islamic State in Pakistan”, *Terrorism Monitor*, Feb. 4, 2016.

^② Ibid.

领导人也已被外界普遍认为加入了“伊斯兰国”^①。阿富汗“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伊斯兰国”不仅在当地控制多个村庄而且在那里实施伊斯兰教法^②。此外，“伊斯兰国”还向楠格哈尔省省会贾拉拉巴德发动了数次袭击，其中包括2015年4月新喀布尔银行贾拉拉巴德支行的炸弹自杀事件，这次袭击共造成3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指出这次炸弹自杀事件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首次大规模武装袭击行动^③。2014年底，部分巴基斯坦塔利班指挥官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并于2015年初进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配合“伊斯兰国”在这一区域的行动，而在塔利班正式确认前任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死亡以及现任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Mansour）因内部斗争受伤（或死亡）之后，“伊斯兰国”也在利用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存在的分歧，不断招募原阿富汗塔利班成员^④。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位于俄罗斯最南部，中亚地区西部，包括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等共和国，属北高加索联邦区。“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广泛招募极端主义者。据俄罗斯内政部和联邦安全局掌握的资料，超过2800名俄罗斯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圣战”，另据达吉斯坦领导人拉姆赞·阿卜杜拉季波夫及内政部部长披露的数字，截至2015年，约643~900名达吉斯坦人正在为“伊斯兰国”作战^⑤。通过上述数字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参加中东“圣战”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加入“伊斯兰国”，仅达吉斯坦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也占“伊斯兰国”俄籍人员数量的40%左右。由此可见来自俄高加索地区的“圣战”分子占“伊斯兰国”俄籍武装分子比例之高，高加索地区已成为向“伊斯兰国”输送成员的重要地域^⑥。其次，“伊斯兰国”

① Farhan Zahid, “Growing Evidence of Islamic State in Pakistan”, *Terrorism Monitor*, Feb. 4, 2016.

② Jessica Lewis, et al., “Afghanistan Threat Assessment: The Taliban and ISI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December 10, 2015.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map/afghanistan-threat-assessment-taliban-and-isis>

③ John C. K. Daly, “Uzbekistan Could Seek Foreign Assistance Against Islamic State”, *Terrorism Monitor*, Apr. 21, 2015.

④ Jessica Lewis, et al., “Afghanistan Threat Assessment: The Taliban and ISI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December 10, 2015.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map/afghanistan-threat-assessment-taliban-and-isis>

⑤ Mairbek Vatchagaev, “Growing Islamic State Influence in North Caucasus Casts Shadow on Local Salafists”,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 8, 2016.

⑥ 比例可能更高，因为在叙利亚活动着“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这些俄罗斯人可能分属不同的圣战组织和团体。

利用该地区存在的宗教社会矛盾以获取支持。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普遍信奉苏菲主义，而俄政府针对少数非苏菲主义信众所采取的较为强硬的政策常引发当地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此外，俄政府试图接管萨拉菲主义者主管的清真寺的行为，也在萨拉菲主义与苏菲主义信众之间造成一定隔阂，“伊斯兰国”利用当地部分“少数派”穆斯林对现状的不满。以谋求其对自身在该地区活动的支持^①。最后，一些地区恐怖组织和基层穆斯林群体加入“伊斯兰国”。2014年年底开始，长期活跃在北高加索的地区分离武装组织“高加索酋长国”（Caucasus Emirate）的一些埃米尔（领导人）开始向“伊斯兰国”效忠^②。与此同时，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车臣和印古什共和国的一些“哲玛提”（jamaats）也开始投靠“伊斯兰国”^③。正因为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不断加入，“伊斯兰国”于2015年6月将该地区命名为新“维拉亚高加索”（Wilayat Qawqaz）^④。

综上所述，在2014至2015年期间，“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活动逐步公开化、组织化，而在俄高加索地区，当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对其支持度也在上升。尽管“伊斯兰国”在这三个国家的活动程度不一样，但均给中亚地区带来了安全挑战，本文将来自中亚周边的外部安全压力分为直接与间接威胁，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直接安全威胁。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将直接面对“伊斯兰国”的武装威胁且防卫能力不足。阿富汗总统曾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及其附属武装已经对西亚和中亚国家构成严重威胁。”^⑤由于“伊斯兰国”历来看重对“领土”的扩张与资源的控制，因此在“伊斯兰国”已在阿富汗取得立足点的背景下，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将可能面对“伊斯兰国”的武

^① Mairbek Vatchagaev, “The Islamic State and Salafism Gained Ground in North Caucasus Last Year”,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 7, 2016.

^② Mairbek Vatchagaev, “Tide of Support for Islamic State in the North Caucasus Causes Alarm in Moscow”, *Eurasia Daily Monitor*, Apr. 16, 2015.

^③ “哲玛提”意为“集体”，是城市穆斯林生活的基层组织。Mairbek Vatchagaev, “The Islamic State and Salafism Gained Ground in North Caucasus Last Year”,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 7, 2016.

^④ Jakob Hedenskog and Erika Holmquist, The threat of the Islamic State to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August, 2015. <https://www.foi.se/download/18.2bc30cfb157f5e989c31820/1477482863711/RUFS+Briefing+No.+28+.pdf>

^⑤ John C. K. Daly, “Uzbekistan Could Seek Foreign Assistance Against Islamic State”, *Terrorism Monitor*, Apr. 21, 2015.

装渗透与挑衅，而土、塔两国军事实力较弱，并不能有效抵御来自“伊斯兰国”的军事威胁。尽管塔吉克斯坦境内部署有俄罗斯军队，但塔吉克斯坦分析家 K. 艾斯力丁（Khurshed Asliddin）认为，塔吉克斯坦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中实力最为虚弱，由于俄罗斯军事预算的紧张以及部分塔民众存在对俄军的抵触心理，俄军的存在不能完全抵消掉“伊斯兰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潜在威胁^①。另据消息披露，2016年初，一批塔利班成员在成功击溃土库曼斯坦边防军之后，深入该国境内劫持犯人索要赎金，这令外界不禁也开始担忧土库曼斯坦的防卫能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国”出于获取资金的需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频繁攻占油田，以走私石油谋利，而土库曼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一侧分布的大量天然气设施同样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攻占的潜在目标^②。

第二，间接安全威胁。首先，“伊斯兰国”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扩张将为其在中亚各国的极端活动提供有利条件。“伊斯兰国”目前在北高加索设立的“圣战者”地下网络已经成为部分赴俄工作的中亚人参加该组织的主要途径^③。如果“伊斯兰国”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它就会利用高加索与中亚地区极端或恐怖主义分子具有的“天然”联系^④，以及两个地区间跨境民族流动，商务人员往来，将恐怖主义的地下网络逐步向中亚国家延伸，这使得中亚社会更易受到极端思想的渗透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其次，“伊斯兰国”引发中亚周边“三股势力”重组，形成更具攻击性的极端势力。相较于中亚周边地区业已存在的“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一方面，“伊斯兰国”自诩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追求建立横跨欧亚的“哈里发”王国，其组织发展更具扩张性；另一方面，“伊斯兰国”袭击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穆斯林，谁不支持“伊斯兰国”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其行为方式更具攻击性。“伊斯兰国”的上述特征从一些区域极端组织中吸引了一批坚持通过武力和恐怖活动与政府对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例如，部分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因不赞同组织高层与政府的谈判，

^① Paul Goble, “Neither Turkmenistan nor Tajikistan Seen Able to Resist Islamic State”,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 12, 2016.

^② Ibid.

^③ Ryskeldi Satke, *et al.*,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in Central Asia: Reality or Spin?”, *Terrorism Monitor*, Mar. 20, 2015.

^④ 中亚地区与北高加索地区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2009年俄罗斯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击毙的8名恐怖分子中，就有5人持哈萨克斯坦护照。参见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

将参加“伊斯兰国”视为其继续进行“圣战”的更好选择^①。“高加索酋长国”内部也因其领导人禁止袭击平民和使用女性自杀炸弹而产生分歧，一些希望对俄政府发动极端袭击的成员将加入“伊斯兰国”作为满足其诉求的出路^②。因此，“伊斯兰国”不仅利用其他极端组织的内部分歧来招募成员，其自身发展也在推动这些分歧的产生和扩大，并最终吸收其他极端组织的激进派，分离温和派。中亚周边“三股势力”的重组将导致一批极端分子因缺少组织内部的制衡而更具攻击性，中亚各国政府将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外部安全环境。最后，中亚国家面对的阿富汗毒品输入问题更加复杂化。众所周知，阿富汗是世界鸦片的主要产地，而与之接壤的中亚地区是阿富汗向外运输和贩卖毒品的主要路径和市场之一，中亚国家长期以来面对阿富汗毒品输入的威胁，毒品问题已成为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斯兰国”将其控制的油田、银行、交通运输设施打造成其获取基金的重要渠道。根据目前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掌握的信息来看，毒品走私也已成为其获取资金的手段之一，因此阿富汗的毒品资源自然不能被其忽视，中亚国家面对的阿富汗毒品问题将可能因为新势力的介入和新资源的投入而变得更加复杂。

（二）中亚地区安全的内部压力

一些民众同情甚至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给中亚各国政府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而中亚地区内部长期存在的“三股势力”以及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也存在被“伊斯兰国”再次激化的可能，在新旧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中亚各国内部的安全压力进一步增大。

第一，回流的“圣战”分子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保守估计，“伊斯兰国”中的中亚人不超过1 200人^③。“伊斯兰国”内部来自中亚地区的“圣战”分子数量分别为：塔吉克斯坦412人，乌兹别克斯坦约200人，吉尔吉斯斯坦50

^① Hannah Byrne, *et al.*, “The Death of Mullah Omar and The Rise of ISIS in Afghanist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August 17, 2015.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s/death-mullah-omar-and-rise-isis-afghanistan>

^② Mairbek Vatchagaev, “Tide of Support for Islamic State in the North Caucasus Causes Alarm in Moscow”, *Eurasia Daily Monitor*, Apr. 16, 2015.

^③ 当前，据统计自中亚地区的人员数量还未有准确数字，国外组织预计数量在2 000~4 000左右，本文采用的数字来自中亚地区内部，特别是各国人数均来自其国家官方人士以及公开的视频报道，土库曼斯坦籍“伊斯兰国”成员数字不详。参见 Ryskeldi Satke, *et al.*,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in Central Asia: Reality or Spin?”, *Terrorism Monitor*, Mar. 20, 2015.

多人，哈萨克斯坦约 200 人^①。在当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遭到严重挫败的背景下，该组织内部的中亚籍武装分子潜回国内的可能性日益增强。根据西方学界研究，每 9 个在国外参战的归国穆斯林武装人员中就会有 1 个在本国继续从事恐怖袭击^②。因此，一些“圣战”者回国后可能受到“伊斯兰国”的指示及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由于中亚“圣战”者普遍在国外进行过军事训练，学习包括射击投弹、炸弹制作、分队协同等军事技巧，这使他们对社会更具威胁性，从 2013 年末开始，在费尔干纳谷地出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原叙利亚参战人员的活动迹象，这也加剧了相关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担心^③。此外，来自“伊斯兰国”俄语媒体“弗拉特”（Furat）的视频显示，在叙利亚作战的中亚武装分子经常被统一进行军事培训，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亚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该经历有助于他们在回到各自母国后建立一个跨国或区域性的联系网络，为他们在更大范围从事极端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伊斯兰国”的活动可能激化中亚社会本已存在的矛盾。目前，中亚各国已经感受到了“伊斯兰国”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一些中亚国家的首都发现匿名悬挂的“伊斯兰国”黑旗，而中亚各国政府 2014 年共逮捕极端分子 110 名，其中 74 名被指控与“伊斯兰国”联系紧密^④。2015 年 1 月，“伊斯兰国”塔吉克斯坦籍极端主义分子通过视频呼吁圣战者推翻塔世俗中央政府，随后 50 名欲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塔籍公民被捕^⑤。本文认为，这些极端主义者在认同“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折射出他们对本国社会现状的诸多不满，如果“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或激进主张更多地渗入到中亚地区，并与中亚本土各种极端主义思想相结合，不仅会衍生一系列极端或恐怖主义事件，更有可能再次激化中亚本已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从而在整体上对中亚各国

^① 数据依次参见 Edward Lemon, “Tajikistan’s Counter – Productiv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Terrorism Monitor*, Jul. 24, 2015. ; John C. K. Daly, “Uzbekistan Could Seek Foreign Assistance Against Islamic State”, *Terrorism Monitor*, Apr. 21, 2015. ; Jacob Zenn, “Kyrgyzstan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to Militant Islamism”, *CACI Analyst*, the 05305/2014. ; Jacob Zenn, “Kazakhstan Reacts to Video of Children With Islamic State”, *Eurasia Daily Monitor*, Dec. 16, 2014.

^② Thomas Hegghammer,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February, 2013, quote from Brian Fishman, *The Islamic State: A Persistent Threat*, Prepared Testimony to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July 29, 2014.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AS/AS00/20140729/102590/HHRG-113-AS00-Wstate-FishmanB-20140729.pdf>

^③ Jacob Zenn, “Kyrgyzstan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to Militant Islamism”, *CACI Analyst*, the 05305/2014.

^④ Edward Lemon, “Tajik Government Hypes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Uses it to Control Population”, *Eurasia Daily Monitor*, May. 1, 2015.

^⑤ Charlie Smith, “Islamic State in Central Asia: threat or opportunity”, *CACI Analyst*, Jul. 8, 2015.

的内部稳定造成冲击。因此，“伊斯兰国”对中亚社会安全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它可以为中亚民众进行的极端主义活动提供支持，而其中亚招募成员的行为和自身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可能成为中亚社会矛盾发展的催化剂。长期以来，中亚地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该地区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土壤，既包括贫穷、失业、人口和土地等欠发达地区常见的社会问题，也有在穆斯林社会与世俗政权之间因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产生的摩擦。对于后者而言，以塔吉克斯坦为例，2011年塔吉克斯坦当局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即禁止未满18岁青少年参加清真寺活动，塔国宗教界颇有影响力的前第一副总理阿吉阿克巴（Haji Akbar Turajonzoda）曾对此表示，世俗力量走向极端主义同样令人担忧^①。值得外界关注的是，因为中亚各国为伊斯兰国家，宗教问题更容易被极端分子利用，所以穆斯林社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摩擦在中亚社会的诸多矛盾之中，更有可能在“伊斯兰国”与宗教极端分子的活动与鼓噪下被局部扩大和激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亚地区的社会震荡。

第三，“乌伊运”（IMU）投靠“伊斯兰国”可能引发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仿效的连锁反应。2014年9月，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袭击的“乌伊运”领导人乌斯曼·加齐（Usman Ghazi）宣布效忠并支持“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随后“乌伊运”对阿富汗士兵和什叶派穆斯林哈扎拉人进行斩首，这是“乌伊运”首次表现出与“伊斯兰国”一致的恐怖手段和极端思想^②。“乌伊运”的行为迅速得到“伊斯兰国”的回应，在“伊斯兰国”媒体发布的乌兹别克语视频中，不仅对“乌伊运”的行为表示盛赞，并且呼吁更多中亚穆斯林加入该组织^③。目前，哈、吉、塔三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组织共约50个，这其中不仅包括被三国共同依法禁止活动的“乌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ETIM）以及“伊斯兰解放党”（又译伊扎布特，Hizb ut - Tahrir），也包括一些被其中一国禁止的恐怖组织，例如，2011年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多起爆炸事件的“哈里发战士”。如果这些恐怖组织出于扩大影响或意识形态相同的原因效仿“乌伊运”而加入“伊斯兰国”，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① Zubaidullo Ubidulloev, *The revival of Islam in post - Soviet independent Tajikistan*, Dushanbe: Rudaki Institute of Language, Literature, Oriental Studies and Written Heritag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2012, pp. 7 - 8.

^② Jacob Zenn, “Al - Qaeda - Aligned Central Asian Militants in Syria Separate from Islamic State - Aligned IMU in Afghanistan”, *Terrorism Monitor*, May. 29, 2015.

^③ Nathaniel Barr, “Wilayat Khorasan Stumbles in Afghanistan”, *Terrorism Monitor*, March. 3, 2016.

对中亚安全的冲击自然不容小觑。一方面，一些投靠“伊斯兰国”的中亚本土化恐怖组织会借助其影响，借机招募成员扩大自身实力与影响，而这些互不联系或隶属的极端或恐怖组织也可能团结在“伊斯兰国”周围，统一行动和目标，扮演“伊斯兰国”向中亚渗透的桥梁；另一方面，向“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靠拢以及恐怖主义的模仿与学习也使得中亚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和所有恐怖组织认定背离伊斯兰教义的信众都将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中亚地区的安全脆弱性也将因此而大为增加。

二 中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的主要原因

根据伦敦国王学院极端主义及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ICSR）的预测，以区域来划分，来自前苏联国家武装分子的数量在参加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外籍人员总数中，位于中东、西欧之后的第三位，而中亚籍“圣战者”的人数又占这其中大约一半^①。因此，对于中亚国家非传统安全研究而言，探讨中亚民众参加中东冲突或者“伊斯兰国”阵营的原因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也只有对中亚民众参加“伊斯兰国”背后推力加以分析，才能针对该组织对中亚地区的威胁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将推动中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的因素概括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伊斯兰国”的特征因素。

（一）社会因素

“伊斯兰国”部分来自中亚地区的武装人员表现出对“伊斯兰国”强硬路线和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一，中亚地区拥有“圣战派萨拉菲”的活动基础。萨拉菲教派在发展演变中逐渐分化出三个派别，即“纯粹派萨拉菲”“政治派萨拉菲”和“圣战派萨拉菲”^②。“伊斯兰国”的思想体系与“纯粹派萨拉菲”倡导自我修行和“政治派萨拉菲”通过政治方式实践伊斯兰不同，而与“圣战派萨拉菲”理念基本一致，它们都是鼓吹通过“圣战”反对异端统治，以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为指导，哈里发为核心的“纯粹”伊斯兰国家，这种思想不仅反对西方世界，反对伊斯

^① Noah Tucker, Central Asian Involvement in the Conflict in Syria and Iraq: Drivers and Responses,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6/CVE_CentralAsiansSyriaIraq.pdf

^② 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

兰什叶派，对伊斯兰国家中的世俗政权也持敌视态度。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中亚地区的一批教职人员就开始受到新近传入的“萨拉菲—瓦哈比”思想的影响^①。该思想中含有原教旨主义和带有激进色彩的部分因素从那时起就成为中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生成的基础之一。“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出现与当代“圣战派萨拉菲”的兴起同步，尽管中亚“圣战派萨拉菲”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恐怖活动，但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萨拉菲“圣战”运动在中亚的宣传和鼓动活动则早已出现^②。当前，中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本土的“圣战派萨拉菲”组织，例如，“哈里发战士”“虔诚首领之军”“向异教徒圣战运动”“安拉战友协会”等，而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和费尔干纳谷地也已成为“圣战派萨拉菲”活动的主要区域^③。这些“圣战派萨拉菲”组织的意识形态与“伊斯兰国”相同，即将自身塑造成“正统”伊斯兰教的护卫者，也宣传通过“伊斯兰教”本源教义来解决中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中亚地区被“萨拉菲”极端主义理念渗透的客观背景下，中亚社会不仅对“伊斯兰国”的“圣战”思想并不陌生，其中一些已经认同上述极端理念的教众或极端主义者更会对“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

第二，中亚社会在伊斯兰教发展方面存在深层矛盾。中亚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助长了极端思想的产生，从侧面推动了中亚民众产生认同“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

1. 社会对宗教知识的需求与宗教学校匮乏的矛盾。公元 7 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传入中亚河中地区和西部呼罗珊地区，公元 9 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此外，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地区历史上由南向北传播，它的影响力也依次减弱。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的苏联建立以后，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在苏联当局的打压下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得到极大的复兴，但中亚民众普遍对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对伊斯兰教知识的认知程度也几乎是碎片化的，特别对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相对较晚的国家而言，这种状况的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大量年轻人需要正规与正统的宗教教育告诉自己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教，怎样做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当前却又

① 蒋海蛟：《中亚圣战派萨拉菲：概念、过程、网络》，载《新疆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② 同上。

③ 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5 期。

普遍缺乏规范的伊斯兰教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合格的宗教老师。据乌兹别克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乌兹别克斯坦共有 9 所伊斯兰学校和一所“塔什干伊斯兰大学”^①。哈萨克斯坦政府管理的宗教学校也只有 10 所^②。相比之下，同样为世俗政府领导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已建成 2 所专门的神学院，4 所包含神学学院的地方大学以及 600 余所伊玛目－哈提普学校（中等宗教学校）^③。尽管土耳其也存在极端主义思潮传播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中亚国家在宗教教育体系方面确实有较大的完善空间。由于缺乏健全的伊斯兰教育体系，中亚社会缺乏正规的宗教学校与合格、充足的宗教老师去传授正确的伊斯兰教义和教法。而又由于清真寺中的一些官方委派的伊玛目们还需要主持婚礼、葬礼等宗教活动，他们通常缺少时间为年轻人答疑解惑，这使得中亚各国正规宗教人士短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④。总之，在历史与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亚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极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侵蚀，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亚青年在参加清真寺或非法宗教组织的活动中，容易被宗教极端分子教唆去反抗中亚各国世俗政权或者灌输错误的宗教价值观，例如不支持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是敌人等，从而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受害者^⑤。

2. 世俗社会与穆斯林社会的矛盾。中亚五国均是建立在世俗政权之上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世俗与宗教两种力量的互动是中亚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态之一。以地理角度观察，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力在中亚地区是南高北低，而吉尔吉斯斯坦既连接着伊斯兰教氛围浓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与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晚的哈萨克斯坦接壤，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碰撞乃至对立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穆斯林社会当前倾向于提倡在公开场合女子穿戴面纱（hijab）和男子蓄长须，而另外一种观点则受到苏联宗教政策的影响，认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应限制在婚礼或葬礼等个人仪式方面，一个穆斯林无需每天去清真寺祈祷或者在斋月期间禁食。由于对宗教文

① 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й при Кабин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http://religions.uz/rus/o_komitete/polojenie_o_komitete/. 转引自张宁：《乌兹别克斯坦宗教管理体制研究》，载《俄罗斯学刊》2014 年第 2 期。

② Zhulduz Baizakova and Roger N. McDermott, “Reassessing the Barriers to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Kazakhstan”,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 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 12.

③ 任婷婷、蒋苑昕：《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载《世界历史》2012 年第 5 期。

④ Zhulduz Baizakova and Roger N. Mc Dermott, “Reassessing the Barriers to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Kazakhstan”,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 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 11.

⑤ Ulan Sadibekov, “Understanding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Through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Its Potential Threat to Kazakhstan”,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4, p. 9.

化存在误解，一些世俗主义者将某些虔诚的宗教行为视为具有极端主义倾向，不仅认为在公众场合女子穿戴面纱和男子蓄长胡须是对世俗文化的威胁，甚至开始担心下一代青少年热衷于宗教事务^①。世俗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的隔阂不会直接产生极端主义，但两者之间如果长期充满误解、猜疑，非理性的思想和言论就会滋生，这将会为“伊斯兰国”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提供某种现实“依据”，从而成为部分中亚民众认可“伊斯兰国”的推手。

3. 伊斯兰化与去伊斯兰极端化的矛盾。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各国政府逐步摆脱苏联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无神论的影响，将伊斯兰文化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号和文化基础，清真寺和穆斯林的数量也因此大为增加，据统计，当前穆斯林在中亚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 92.6%。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复兴的同时，中亚各国世俗政权也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宗教思想可能的极端化发展，正如前文所述，这两个过程之间所产生的摩擦也是中亚社会具有的矛盾之一。在目前对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西方学界普遍将中亚各国政府在去伊斯兰极端化方面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视为中亚产生极端主义活动的推动因素之一，认为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问题上，政府采取的一些强硬和“一刀切”的做法对宗教自由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例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和 2013 年对全球 18 个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的排名，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分数最低^②。世俗政权所采用的一些手段不仅有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嫌疑，也忽视了奉行温和路线的穆斯林以及倡导宗教改革人士的利益和呼声，容易引发社会紧张与不满，导致部分中亚民众产生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推动他们认同恐怖组织的极端理念。这种观点在 2015 年 4 月原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上校哈利莫夫（Halimov）叛逃“伊斯兰国”的事件中有所印证。哈利莫夫在“伊斯兰国”录制的视频中曾宣称，他加入“伊斯兰国”的原因就是不满塔吉克斯坦政府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奉行的宗教政策，政府并不尊重穆斯林祈祷和穿戴头巾的权利^③。笔者认为，中亚各国政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无可厚非，一些举措也颇为有效，但在中亚人被“伊

^① Jacob Zenn and Kathleen Kuehnast,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in Kyrgyzstan”, *Special Report*, October 2014. p. 355.

^② Arne C. Seifert, Prevent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Central Asia Conditions, risks and peace policy requirements, Bundesakademie für Sicherheitspolitik, Security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7/2016. https://www.baks.bund.de/sites/baks010/files/working_paper_2016_07.pdf

^③ Edward Lemon, “Tajikistan’s Counter – Productiv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Terrorism Monitor*, Jul. 24, 2015.

伊斯兰国”招募的部分案例中，由中亚世俗政权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措施与手段“简单粗暴”所引发的不满也确实存在，因此这一问题在中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背后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恐怖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为，在经济状况不好、生存条件较差的背景下，个人容易受到恐怖组织的煽动，特别对于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轻人而言，不仅容易接受反社会的极端思想，也难以抵抗极端组织别有用心金钱的诱惑。

目前，中亚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中亚地区能源出口大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受到国际油价低迷的冲击，而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势头也受到俄罗斯经济不景气和卢布贬值的双重负面影响，不仅造成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与天然气进口量减少，也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2014 年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对卢布汇率升值 80%，成为中亚国家货币对卢布汇率升值最大的国家，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对卢布升值也分别达到 75%、45%、37%^①。这样一种局面导致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不具竞争力，这使得主要依托于俄罗斯市场的中亚出口企业的利润乃至生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 2015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分公司就削减了当地工人工资的 25%^②。在中亚区域经济整体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亚各国的就业形势颇受压力，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三个中亚南部国家而言这种状况更为突出。塔吉克斯坦总统在 2015 年指出，每年该国毕业大学生和专科生大约为 15 万人，但他们当中每 7 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在国内找到工作^③。塔吉克斯坦面临的就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中亚地区就业环境的一个缩影，目前的中亚经济状况恐怕使这一问题更加不容乐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预测，吉尔吉斯斯坦的失业率为 8%，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为 10.7%，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 15.7%，乌兹别克斯坦可能高达 20.3%^④。

^① Nate Schenkkan,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Russia on Central A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15, No. 165, p. 4.

^② Ibid.

^③ John C. K. Daly, “Russia’s New Passport Regulations Impose Additional Hardships on Tajik Migrant Workers”, *Eurasia Daily Monitor*, Nov. 26, 2014.

^④ Nurzhan Zhambekov, “Russia’s Regul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Set to Hurt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CACI Analyst*, Apr. 29, 2015.

在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面前，中亚年轻人不仅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成为恐怖组织的渗透对象，他们也有可能因为需要谋生和还债的原因参加诸如“伊斯兰国”或类似恐怖组织。哈萨克斯坦 2012 年举行的“反恐形势工作会议上”，国家副检察长约翰·默克尔（Johann Merkel）曾表示：“根据政府掌握的数据，哈萨克斯坦国内大约 60% 的恐怖分子在 29 岁以下，而他们 95% 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换句话说，这些参加恐怖组织的年轻人通常正在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失业的年轻人在哈萨克斯坦是没有前途的。”^① 在世界范围内，贫困和高失业率历来是各种反社会思潮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教育程度低的失业青年历来是中亚极端组织成员输入的重要资源之一，因此，中亚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也一直与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相互交织。在中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的原因分析层面，特别是在当前中亚地区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局面下，失业问题应成为不能忽视的推动因素之一。

根据目前掌握的“伊斯兰国”内部塔吉克斯坦籍武装分子的信息，这个群体具有三个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大部分为年轻男性，年龄在 18 ~ 40 岁之间；其次，他们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最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去叙利亚或伊拉克之前，在俄罗斯停留过一段时间^②。对于前两点信息，在前文分析中已有所涉及，而对于塔吉克斯坦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多数来自俄罗斯这一特征，笔者认为这与赴俄中亚劳工就业和生存境况的恶化相关，而这一因素也是推动中亚人参加“伊斯兰国”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境外务工人员输入国，来自前苏联地区的人们利用文化相近、通晓俄语和护照免签的优势来俄寻求就业机会，在每年数以百万计赴俄务工人员中，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人数占绝大多数。根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 2015 年在俄境外务工人员中统计，乌兹别克斯坦为 222 万，塔吉克斯坦为 99.9 万，吉尔吉斯斯坦为 54.5 万^③。为了对境外劳动者加强管理，减少相应社会问题以及引进高素质的务工人员，俄罗斯政府于 2015 年 1 月颁布了新的管理办法，即赴俄工作人员需通过俄语和俄国

^① Aidos Bauyrzhanuly Altynbekov, “Almaty (Kazakhstan) Youth’s Work Values: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5, Vol. 11, No. 14, pp. 46–47.

^② Edward Lemon, “Tajikistan’s Counter – Productiv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Terrorism Monitor*, Jul. 24, 2015.

^③ Nurzhan Zhambekov, “Russia’s Regul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Set to Hurt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CACI Analyst*, Apr. 29, 2015.

历史考试，购买医疗保险并为工作许可证支付更高的费用，此外，对来自非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务工人员将需要办理护照而不能再用其国内身份证^①。更加严格的境外劳工管理措施对仍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及对俄劳动力输出最多的两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影响最大。不仅非法劳工面临被驱逐的压力加大，两国合法入境的劳工也需要支出更多成本以及经历更多环节。例如一本塔吉克斯坦的出国护照需要花费数百美元，而私下渠道办理则更加昂贵，这对于一个最低月工资不到 50 美元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加令外界忧虑的是，每年中亚劳工从俄罗斯寄回母国的汇款相当可观，中亚劳工往往是其国内家庭的经济支柱。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乌兹别克斯坦收到在俄务工人员的汇款金额约占本国 GDP 的 11%，塔吉克斯坦约的 50%，吉尔吉斯斯坦超过 30%^②。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些汇款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基本用于生存需要。例如，塔吉克斯坦的家庭将 47% 的汇款用于日常消费，22% 用于医疗和教育，15% 用于房屋整修，10% 为存款；乌兹别克斯坦的家庭将汇款的 80% 用来满足最低生活消费^③。因此，对于这些在俄罗斯工作的中亚人而言，俄罗斯经济危机导致房地产和建筑业的不景气（俄境外劳工主要的就业领域），卢布贬值带来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对境外劳工的管理日趋严格，使得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形势更加严峻，而在这个群体身上承担着维系家庭生存的压力，又加剧了他们在俄罗斯工作的负担，放大了他们目前在俄工作的困境。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中亚劳工在俄罗斯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因为工作环境危险、身体健康得不到保证以及来自民族主义的攻击，每年有数百名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劳工在俄罗斯死亡。据 2011 年的报道，全年在俄罗斯死亡的塔吉克斯坦人超过 600 人。另据不完全统计，在俄罗斯每 1 000 名外籍劳工中就有一名处于危险之中^④。在上述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赴俄工作的中亚劳工开始通过宗教信仰寻求慰藉，他们不仅容易受到恐怖组织的煽动，更有可能因为较高的经济酬劳而加入恐怖组织。以塔吉克斯坦街头出现的“伊斯兰国”招募传单为例，加入“伊斯兰国”的月收入可能达到

① Nurzhan Zhambekov, "Russia's Regul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Set to Hurt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CACI Analyst*, Apr. 29, 2015.

② Ibid.

③ Пешкова В. М.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емей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из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России // Мониторинг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2016. № 1. С. 240 - 255.

④ Aida Kasymalieva, Erica Marat, "Kyrgyz and Tajik Migrants in Moscow Speak Out",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n. 27, 2012.

1 500美元，甚至更高^①。这对于在俄罗斯平均月工资在3.5~4.5万卢布（600美元左右）的中亚劳工而言，无疑是一种诱惑。

（三）“伊斯兰国”的特征因素

部分中亚民众为何选择“伊斯兰国”而非其他恐怖组织，这需要从“伊斯兰国”的组织特征去剖析，除宗教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外，也不能排除中亚年轻人参加“伊斯兰国”另有其他原因，这也应从“伊斯兰国”内部情况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伊斯兰国”对于中亚极端主义者具有三个方面的吸引力：一是意识形态更加极端化。与基地组织相比，它的“圣战”路线更加强硬，意识形态更加极端。例如，“伊斯兰国”不仅将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塔克菲尔（又称叛教者，takfir）的标准扩大至伊斯兰教什叶派这一群体，甚至将穆斯林中不效忠“伊斯兰国”的人都列为叛教者。“伊斯兰国”曾指责基地组织不将穆斯林纳入攻击目标的做法，并没有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为了区别它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分歧，“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德纳尼（Shaykh Abu Muhammad al-Adnani）在2014年就特别强调，“基地组织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而且永远不会。”^②因此，更加极端化的“伊斯兰国”对于中亚地区最为激进和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更具吸引力。二是“哈里发”国家实体化。与中亚“圣战派萨拉菲”组织相比，“伊斯兰国”并没有拘泥于刻板和复古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纯粹追求在区域或世界范围内发动“圣战”，在某种程度上，它已将这种乌托邦似的“建国”思想实体化，通过在中东两河流域建立“哈里发国家”，使建立“纯净”伊斯兰世界的图景更具说服力，这是中亚其他恐怖组织不具备的。三是能满足“圣战者”多样化的需求。对于潜在的招募对象，“伊斯兰国”并没有局限于宗教和经济手段，也并未将自己束缚在一个“正统”伊斯兰教继承者的道德标准上。针对不同群体，它表现出一种表面并不激进却满足个体不同需求的招募方式，“伊斯兰国”在对外宣传中试图将“圣战”融入更多非宗教的因素，将其打造成任何人都能参与并且人人都会有所收获的含有“伊斯兰国”特色的“圣战”，无论是喜欢冒险或是渴望大家庭温暖的人都能迅速融入到“伊斯兰国”之中，这对于宗教氛围较为宽松、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亚北部地区，可能更受欢迎。

^① Charlie Smith, “Islamic State in Central Asia: Threat or Opportunity”, *CACI Analyst*, Jul. 8, 2015.

^②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Fight Them Until There Is No Fitnah’: The Islamic State’s War With al-Qaeda”, *Terrorism Monitor*, Feb. 20, 2015.

三 遏制“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因素

就目前形势而言，虽然“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构成了一定挑战，但遏制其在中亚地区发展的因素也同样存在，只有对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作出客观判断。

第一，中亚主流社会并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政治理念和极端路线。“中亚国家内部地域和族属的观念明显强于宗教信仰，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其分支的穆斯林组成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很难行得通。”^①换言之，中亚各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普遍较高，大部分民众对“伊斯兰国”建立跨区域“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并无多少热情。此外，中亚地区信众人数最多的逊尼派哈奈斐学派，少数信奉苏菲主义或什叶派的信众，以及代表这些信众利益的高官和伊斯兰政治家，他们对于意识形态为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伊斯兰国”也多有抵制^②。皮尤研究中心出版的报告显示，在中亚地区仅 12% 的人支持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为官方法律，仅 28% 人支持给予宗教领导人以相应政治地位，78% 的人认为伊斯兰国家与现代世界并不矛盾，同时视自杀袭击是不负责任做法的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占 82%，塔吉克斯坦占 85%，哈萨克斯坦则是 95%^③。

第二，中亚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始重视打击“伊斯兰国”。为了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中亚各国以及区域组织已经制定了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能够减弱“伊斯兰国”对于中亚国家的威胁：一是在国家层面，针对“伊斯兰国”军事袭击的风险，塔吉克斯坦向俄罗斯申请 12 亿美元援助用于升级塔阿边境军事设施，并已获得俄罗斯的积极回应；针对公民参加“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塔吉克斯坦议会在 2014 年初批准了关于塔籍公民参与境外军事冲突的刑法修正案，使任何参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塔吉克斯坦公民都被视为违法。同年，哈萨克斯坦也通过新的反恐法案，禁止涉嫌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个人入境；针对“伊斯兰国”利用媒体和社交工具进行宣传，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① 苏畅：《伊斯兰解放党与中亚安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② Arne C. Seifert, Prevent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Central Asia Conditions, risks and peace policy requirements, Bundesakademie für Sicherheitspolitik, Security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7/2016. https://www.baks.bund.de/sites/baks010/files/working_paper_2016_07.pdf

^③ Ibid.

斯坦限制或关闭了国内外部分网站。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 2015 年颁布的新刑法规定，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工具宣扬极端和恐怖主义的人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青年人受到极端宗教思想误导，哈萨克斯坦精神委员会成立工作组，在年轻人中间阐释传统伊斯兰教价值观，乌兹别克斯坦也正在实施少年犯人保护计划，将少年犯置于社区宗教机构管理之下，以防止其在监狱中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侵蚀。二是在区域组织层面，2015 年 4 月，上合组织反恐委员会在塔什干商讨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针对“伊斯兰国”采取联合行动的相关事宜，并制定了 2016~2018 年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的行动计划，而在上合组织反恐机构的框架内，成员国也在双边层面合作应对此类挑战，例如中乌两国就合力打击从中东潜逃回国的恐怖分子达成一致。2016 年 10 月，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进行了快速反应部队的联合演习。此外，中亚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位列东盟安全事务的优先议题，为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欧盟—中亚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于 2013 年建立，该机制为双方共同关心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运输问题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在第二论高级别安全对话之后，欧盟与中亚五国均同意在安全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欧盟同意拨款 879 万欧元用于相关安全议题的合作^①。

第三，来自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的牵制。在中亚地区两翼，2015 年 1 月，在美军的空袭下，“伊斯兰国”分支武装“维拉亚呼罗珊”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些重要人物被炸身亡^②。俄罗斯也在 2016 年 7 月出台了更加严厉的反恐法案。除此以外，本文认为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对“伊斯兰国”的牵制作用也不容忽视。对于所属分支组织或成员加入“伊斯兰国”的背叛行为，北高加索地区恐怖组织“高加索酋长国”一直对“伊斯兰国”持批评和谴责态度，目前也没有任何信息表明“高加索酋长国”头目愿意与“伊斯兰国”合作。因此，尽管两个组织之间并未爆发明显冲突，但“高加索酋长国”对“伊斯兰国”在本地区的扩张保持排斥和警惕心理的可能性较大，会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所属极端分子发生进一步的背叛行为，这对“伊斯兰国”在中亚西部招募其他极端组织成员的行为会起到一定制约作用。相比而言，阿富汗区域恐怖组织与“伊斯兰国”

^① Sebastiano Mori and Leonardo Taccetti, *Rising Extremism in Central Asia? Stability in the Heartland for a Secure Eurasia*,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http://www.eia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EIAS_Briefing_Paper_2016_Mori_Taccetti_Central_Asia.pdf

^② Nathaniel Barr, “Wilayat Khorasan Stumbles in Afghanistan”, *Terrorism Monitor*, Mar. 3, 2016.

的对抗更为明显，“伊斯兰国”近期内在阿富汗的活动仍然受到塔利班的牵制。2015年8月，为了打击“伊斯兰国”势力，阿富汗塔利班对已向“伊斯兰国”效忠的“乌伊运”展开武装进攻。据“伊斯兰国”内部知情人士披露，“乌伊运”在阿富汗查布尔省遭到塔利班的毁灭性打击，其领导人乌斯曼·加齐可能被俘^①。由于塔利班组织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发展目标方面均与“伊斯兰国”存在不同，它更将“伊斯兰国”视为争夺阿富汗控制权的竞争者，除非外界环境变化，两个组织在阿富汗合作的几率也非常小^②。

结 语

综合来看，“伊斯兰国”自2014年6月宣布重建“哈里发国”以来，除有少数极端分子在公共场所粘贴宣扬“伊斯兰国”思想的传单和挂“伊斯兰国”黑旗的事件发生以外，中亚地区并未爆发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大规模、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动，目前该地区安全形势在整体上可控并保持稳定。然而，“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潜在挑战仍然存在，特别是该组织在国际联军的打击下遭到一系列重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越来越难以公开立足，“伊斯兰国”是否会在中亚或其周边地区需求新的立足点，加入“伊斯兰国”的中亚人是否会大量潜逃回国，从而加大中亚地区的安全压力，这种不确定因素值得中亚各国政府警惕。因诸多因素的制衡以及中亚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采取防范“伊斯兰国”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发展步伐，但是，根据本文在中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的原因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中亚的恐怖主义问题不仅涉及国内宗教、经济等结构性问题，也与周边国家的境外劳工境况密切相关，任何打击“三股势力”的单一手段都难以一劳永逸，而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因此今后如何采取更为全面、综合和科学的手段应对“伊斯兰国”或恐怖主义的安全挑战，特别是国家对青年就业环境的改善，宗教信仰的培养以及同相关国家合作对境外劳务人员的有效管理和权益保障，应当成为中亚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Nathaniel Barr, “Wilayat Khorasan Stumbles in Afghanistan”, *Terrorism Monitor*, Mar. 3, 2016.

^② 塔利班的目标是在阿富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斯兰国”目标是建立跨洲际的“哈里发”国家，并且组织全球“圣战”。